

繁體中文版「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 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

張益慈¹ 詹雨臻² 陳學志³

摘要

自我監控在過去被視為單因子測量結構，但近期證據顯示自我監控應為包含兩互相獨立的雙因子結構，並強調納入保護性自我監控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旨在引進 Wil-mot 等（2017）編製的「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Scale, APSMS），經中文化修訂發展成繁體中文版「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PSMS-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APSMS-TC），並探討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與人格特質、主觀幸福感與暗黑特質的關係。本研究以 621 位國內大學生為樣本進行信效度分析，結果顯示 13 題的 APSMS-TC（含獲得型自我監控 6 題，保護型自我監控 7 題）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alpha = .77、.67$ ）、組合信度（CR = $.77、.67$ ），以及合理的建構效度（RMSEA = $.08、SRMR = .06$ ）。獲得型自我監控與開放性、外向性呈正相關，並對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具正向預測力，且與暗黑特質中的自戀、病態人格與虐待呈正相關。保護型自我監控則與情緒性呈正相關，並對負向情感具正向預測力，對生活滿意度具負向預測力，且與暗黑特質中的馬基維利主義、病態人格與虐待呈正相關。本研究為國內首度引進「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並首次探討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主觀幸福感的關係，未來可應用 APSMS-TC 於職場與人際情境之測量，增進對自我監控與職場人際行為以及心理健康相關性之了解。

關鍵詞：自我監控、幸福感、性格模式、暗黑特質、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

1. 張益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

2. 詹雨臻，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3. 陳學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收件日期：2021.06.10；完成修改：2022.05.25；正式接受：2022.05.30

通訊作者：陳學志；Email：chcjyh@gmail.com

地址：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Scale (APSMS-TC)

Yi-Tzu Chang¹ Yu-Chen Chan² Hsueh-Chih Chen³

Abstract

The univariate model of self-monitoring has been the predominant paradigm in past research. However, recent findings advocate an alternative bivariate model of self-monitoring, which emphasizes the protective role of self-monitoring.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Scale (APSMS-TC) originated by Wilmot et al. (2017).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quisitive self-monitoring,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ie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ark traits are discussed. Results showe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ies and composite reliabilities for 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subscales ($\alpha = .77, .67$; $CR = .77, .67$).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reasonable model fit for a two-factor solution ($RMSEA = .08$, $SRMR = .06$). Acquisitive self-monitor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extraversion and openness, as well a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positive affect. Acquisitive self-monitoring also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narcissism, psychopathy, and sadism.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emotionality and negative affec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atisfaction with life.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also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Machiavellianism, psychopathy, and sadism. Metric invariance existed between gender. In sum,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first study to 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variate model of APSMS that yields good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among college sample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APSMS-TC contributes to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multiple domains such a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personality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Keywords: 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dark trait, personality model, self-monitoring, well-being

1. Yi-Tzu Chang, Ph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Yu-Chen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3. Hsueh-Chih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ceived: 2021.06.10; Revised: 2022.05.25; Accepted: 2022.05.30

Corresponding Author: Hsueh-Chih Chen; Email: chcjyh@gmail.com

Address: No. 162, Sec. 1,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308, Taiw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壹、緒論

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 SM)，或譯作自我警覺 (簡明輝，2004)，係屬一種人格特質，意指個體依照社交適切性 (social appropriateness) 調整其行為表現的傾向與能力 (Snyder, 1974)。自我監控之目的可能包含透過較為強烈、誇張的行為表現進行溝通表達，或是透過隱藏不適當的 (或是與真實情緒不符的) 情緒反應，以促成社會適應 (social adaptive) 的自我展現；換言之，自我監控可能是多面向的。在國內，自我監控議題常見於工商心理學領域，並且經常被作為特定職場行為的預測因子，例如：自我監控被發現與情緒勞務 (emotional labor) 有密切關係 (吳宗祐、鄭伯壘，2006；羅妙虹、陳建志、謝秉蓉，2018)，或是與職涯投入有關 (陳心懿、鄭宇容，2018)。在認知心理學領域，自我監控被視為一種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例如：學生以自我監控策略針對自身的學習表現進行自我評價和自我覺察，藉此改善學習標的行為；或是運動選手使用自我監控策略對其運動表現進行記錄和評量，以精進運動技巧。本研究所探討的自我監控，係屬工商心理學領域範疇所定義的自我監控。

Snyder (1974) 將高自我監控者譬喻為「變色龍」 (chameleon)，形塑高自我監控者對情境訊息敏銳，能夠因地制宜的調整其外在行為，以符合情境所需或角色期許，在職場上富有「精明且務實」 (shrewd and pragmatic) 的形象。然而，近期研究指出自我監控可能也有其潛在的陰暗面；由於高自我監控者有擅於隱藏真實自我的特徵 (簡明輝，2004；Robbins, 2005/2006)，自我監控亦有可能引起個人及其社交網絡甚或是組織的不良效應 (Kudret et al., 2018)。而在自我監控的評量方面，Snyder 所發展的「自我監控量表」 (Self-Monitoring Scale, SMS) 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單因子自我監控測量工具。然而，Briggs 等 (1980)、Briggs 與 Cheek (1988) 以及 Lennox (1988) 均指出，SMS 的單因子測量結構與自我監控的理論架構並不相符。Lennox 指出，依據 Arkin (1981) 提出的自我呈現理論 (self-presentation)，個體基於不同的情感／社會動機—渴望獲得社會認同或避免社會拒絕，會發展出兩種不同的自我呈現策略：獲得型策略或保護型策略，並依此調整自我的外在行為。Lennox 依此提倡自我監控應同樣由互為獨立的獲得型自我監控 (acquisitive self-monitoring, ASM) 與保護型自我監控 (protective self-moni-

toring, PSM) 共同組成，並指出 SMS 所測得的自我監控多偏向 ASM，而忽略了對自我監控保護性角色一面的重視與探討。

有鑑於諸多學者對自我監控單因子測量結構提出質疑，以及近期研究趨勢揭露自我監控可能潛藏對人際或組織網絡的破壞性，本研究旨在引進由 Wilmot 等 (2017) 所編製的「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Scale, APSMS)，透過中文化修訂形成繁體中文版之「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PSMS-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APSMS-TC)，為國內首度引進雙因子自我監控概念並發展的中文化評量工具，同時首次探討自我監控與人格特質、暗黑四特質〔dark tetrad，一組亞臨床社會厭惡特質，包含馬基維利主義 (Machiavellianism)、自戀 (narcissism)、病態人格 (psychopathy) 與虐待 (sadism)〕以及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由於自我監控是一種自我呈現的方式，故其在人際互動與社交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值得探究。透過本研究之發現，自我監控議題可不僅侷限於工商心理學範疇之討論，更能推及至社會心理學、諮商輔導領域之應用。

貳、文獻探討

一、自我監控的利與弊

在將自我監控視為單因子結構的前提下，Snyder (1974) 指出高自我監控者的社會動機在於期望獲得大眾肯定，並且擅於取得他人對自身的好印象。因此在企業組織內，高自我監控者擅長擔任行銷或顧問的角色。另一方面，低自我監控者的人際因應模式，主要是以觀念、原則、自我內在感覺與需求為依歸；其社會動機在於反應真誠的內在自我，故較不會因不同場合轉換行為表現或想法以符合他人對自身的角色期待，行為較趨向一致 (戚樹誠，2016；Sampson, 1978)。故低自我監控者在組織中擅於擔任提供專業意見判斷的人員，或是在團體決策中扮演黑臉的角色 (George & Jones, 2003/2004)。

據此，高自我監控者被視為高社會實用主義者。在 Day 等 (2002) 的後設分析文章中也指出，自我監控對成功的領導行為扮演關鍵的角色。然而，相較於低自我監控者，高自我監控者更容易感受外在情境線索，因此也更容

易表現出隱藏自我的順從行為，或更游刃有餘在組織中的政治與權力遊戲（Robbins, 2005/2006）。近期，Kudret 等（2018）的回顧性文章揭示自我監控可用以預測因錯誤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而起的決策偏差（Bauman & Geher, 2002），且與道德疏離以及不道德的商業決策或販賣行為有關（Corral & Calvete, 2000; Ogunfowora et al., 2013; Yang et al., 2018）。Bedeian 與 Day（2004）發現，高自我監控者傾向在組織內拔擢與自身擁有相同特質的員工，在較為極端的情況下可能會傷害組織內多元聲音的表達；且由於男性具有較高的自我監控特質（Day et al., 2002），更容易因此造成女性員工在職場上受到排擠而失去晉升高階管理職的機會。自我監控同時也與較高的角色壓力（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有關，故可能連帶產生對職員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Day et al., 2002）。

回顧自我監控問世至今 40 餘年的發展，自我監控常被用來檢測與工作行為相關的變項，例如：職場表現、領導力、組織承諾與角色壓力等（Day et al., 2002）。然而，上述近期研究結果指出，自我監控或許也帶有引起人際交往或組織崩壞的暗黑效應（dark effect），因此重新檢視在自我監控精明的一面下潛藏的陰暗面有其必要性。

二、自我監控：從單因子到雙因子模式

Briggs 等（1980）及 Briggs 與 Cheek（1988）透過因素分析發現，無論是 Snyder（1974）的 SMS，或是由 Snyder 與 Gangestad（1986）後續修訂的 18 題「自我監控量表」（SMS-R），兩者均被發現為多因素結構。Briggs 與 Cheek 更指出，SMS-R 實則包含兩項對立的因子，分別和親社會行為（如社交權力）與趨避社會行為（如害羞）有關。Lennox（1988）則指出，SMS 中的題項缺乏一致性，除了測量到如表演行為、善於交際等較偏向獲得型自我監控的一面外，部分題項也測量到如渴望被團體接納、較為被動或是反應式（reactive）的社交行為等偏向保護型自我監控的一面。Lennox 因此呼籲，應修訂自我監控理論為包含獲得型自我監控與保護型自我監控的雙因子模式。然而，以截至目前的引用數觀之，Snyder 文章的引用數（約 2100 次）是提倡雙因子自我監控的 Lennox、Lennox 與 Wolfe（1984）文章的近 3 倍（兩篇合併共約 770 次），顯示單因子 SMS 的能見度仍居主宰地位。若是以「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為關鍵字進行搜尋（2022 年 5 月，SCOPUS），相關文獻自 1986 年起至今僅 10 餘篇，更說明雙因子自我監控發

展至今仍僅受到極少數的關注。

近期，Wilmot (2015) 利用分類分析法 (taxometric analysis) 為自我監控的雙因子結構增添了新的實徵性證據，並運用項目反應理論重新將 SMS 建構成「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PSMS) (Wilmot et al., 2017)。細部檢視 APSMS 題項中的 ASM 和 PSM 分量表所包含之元素，ASM 包含了表演能力 (acting ability；如「如果我去演戲，應當是一個不錯的演員」)、吸引他人注目 (如「在一群人當中，我很少成為注目的焦點」)，並且帶有主動活躍的特徵 (如「我曾經考慮當一名綜藝咖／諧星」)。透過上述積極、主動等趨近性 (approach orientation) 的自我呈現技巧，高獲得型自我監控者可透過展現自信且善於營造氣氛的自我形象獲得社會認同；這部分與過去認為高自我監控者具有良好的以自我為中心之印象整飾技巧 (self-directed impression management) 有關。

另一方面，PSM 包含了假裝、隱藏真實自我 (如「即使不開心，我也經常假裝自己過得很開心」)、以他人為導向 (如「為了被喜歡，我傾向成為人們期望我成為的樣子」)，以及依情境調整行為的跨情境變異性 (如「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人，我的行為舉止也將全然不同」)。相較於高 ASM 者的趨近策略，高 PSM 者在人際互動的脈絡下呈現依照情境反應的被動角色，透過人際互動中的情緒線索作出符合情境或是他人期待的行為，以便將社交拒絕的風險降到最低。其中，行為的跨情境變異性似乎更貼近於過去對高自我監控者「變色龍」特徵的描述。Lennox (1988) 指出，PSM 可能與社交焦慮、沉默、順從行為有關。Kückelhaus 等 (2020) 則指出，高 PSM 者會出現更多逢迎行為，以確保自己為團體所接納。

三、自我監控與人格特質

在企業組織中，外向性較高的員工更能勝任需要與人或社會互動的管理或推銷工作，因此了解個體的人格特質與自我監控對組織有重要意涵，也有利於職務分派。外向性指的是「對於與他人間關係感到舒適的程度以及人際互動頻率」(戚樹誠，2016)。Lippa (1978) 及 Morrison (1997) 指出，自我監控與外向性有高度正相關，這也與過去研究指出高自我監控者活潑、鮮明的形象不謀而合。而在近代，Wilmot 等 (2017) 則指出，ASM 與外向性、開放性 (興趣的多寡和深度) 呈中等到強烈程度的正相關，PSM 則與神經質性 (能激起其負面情緒所需的刺激數目與強度) 呈中度正相關。上述結

果呼應了自我呈現理論之論點——ASM以外向、開放的趨近性策略以獲得社會認可，以及PSM可能因其神經質的傾向而在人際情境中傾向採用被動、觀察的趨避策略，以避免社會拒絕。

比起常見的五大性格特質，自我監控所測量到的更貼近於「個體實際外在表現行為與內在情感狀態落差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Ogunfowora 等（2013）在大學生樣本身上發現自我監控與 HEXACO 性格模式（HEXACO personality model）¹（Lee & Ashton, 2005）中的誠實—謙遜性（honesty-humility）呈負相關。誠實—謙遜性所測量的是個人是否真誠待人、會不會去操弄別人、欺騙別人、占人便宜、貪圖物質享受或社會地位、誇大自己的重要性或特權等（許功餘，2018）。該研究同樣發現，誠實—謙遜性可作為自我監控與道德疏離以及不道德的商業決策行為的解釋因子。上述結果初步揭露了自我監控在其性格本質上的黑暗面，並且可與 Pillow 等（2017）指出自我監控與個體真實性（authenticity）呈負相關的結果相呼應。然而，目前需要更多的實徵研究支持自我監控與低誠實—謙遜性的相關性。故本研究將以繁體中文版的 HEXACO-60（Hsu, 2010）作為本研究效標變項之一。除欲重複驗證自我監控與誠實—謙遜性的相關性外，也藉此增加自我監控與不同人格特質測量工具在研究結果上的多元性。

四、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

暗黑特質係屬一組亞臨床社會厭惡特質，包含馬基維利主義、自戀與病態人格（Paulhus & Williams, 2002）。馬基維利主義係指一種相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之性格傾向，主要展現在與權力和個人得失有關的功能性社交策略手段；自戀係指浮誇且優越的自我價值，並帶有自我中心的性格傾向；而病態人格則是一種違常的人格結構，以高衝動性、情緒淡漠以及低同理心、道德感與愧疚感為主要特徵。高暗黑特質者在人際交往情境中透過操弄他人達到自利目的。而儘管高自我監控被視作社會適應的表現，自我監控也可被高暗黑特質者用來作為形塑其外向、具有表面魅力形象的手段，並可透過情境線索持續調整自身行為，以投射出符合角色期待的樣貌，藉此掩飾其行為

1. HEXACO 取誠實—謙遜性（honesty-humility(H)）、情緒性（emotionality(E)）、外向性（extraversion(X)）、和悅性（agreeableness(A)）、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C)），以及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O)）每字字首而成，後以 HEXACO 稱之。

惡意的本質，例如：高馬基維利主義者擅長即興的情況（戚樹誠，2016），或是病態人格被指出具有變色龍的特質（Erikson, 2017/2019），都顯示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應具有正相關。

Rauthmann (2011) 檢視了暗黑特質與自我監控的關係，發現不同的暗黑特質分別與不同的自我監控有關：高自戀者與 ASM 有較為突出的正相關（ $r = .11 \sim .36$ ，與 PSM $r = .10 \sim .15$ ），高馬基維利主義者與 PSM 有較為突出的正相關（ $r = .32 \sim .36$ ，與 ASM $r = -.18 \sim .09$ ），病態人格則均與 ASM 和 PSM 達低度正相關（與 ASM $r = .04 \sim .28$ ，與 PSM $r = -.04 \sim .19$ ）。Kowalski 等 (2018) 則是使用 SMS-R 發現暗黑特質與自我監控均呈顯著正相關（與自戀、病態人格、馬基維利主義相關係數依序為 $rs = .40$ 、 $.23$ 、 $.19$ ）。該研究同時發現自戀與社會期望有顯著正相關（ $r = .14$ ），但馬基維利主義、病態人格與社會期望則呈顯著負相關（ $rs = -.36$ 、 $-.20$ ）。社會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指的是個體傾向於認同能令人產生良好印象或符合社會期待的反應心向（Edwards, 1957），故高自戀傾向者更容易做出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而高馬基維利主義、高病態人格者則與社會期望背道而馳。上述結果顯示，不同暗黑特質可能因對社會期望的重視不同而可能傾向不同的自我監控策略。

由於目前僅有少量研究探討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的關係，故本研究將以繁體中文版的「暗黑四特質量表」（張益慈等，2021）作為本研究效標變項之一，藉此回應 Rauthmann 與 Kowalski 等的研究發現，並增加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相關性在華人樣本的證據。一如 Dutton (2013) 指出，病態人格常見的職業首位為企業執行長，又高馬基維利主義者常見於職場管理階層，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的關係無論在一般人際社交或是職場情境都極具探索價值。

五、自我監控與心理健康

近年有少數研究開始探討自我監控與心理健康的關係。Huang 等 (2019) 發現教師的自我監控與焦慮、憂鬱呈正相關。Smith 等 (2019) 則發現，自我監控可做為情緒壓抑與孤獨相關性的調節因子；對高自我監控者而言，情緒壓抑與孤獨具有顯著正相關，然而此相關性未見於低自我監控者。此外，自我監控與個體在親密伴侶關係中所感受到的權力不對等（Oyamot et al., 2010）、較差的關係滿意度、較高的關係不滿意度，以及較高的離婚率（Leone & Hall, 2003）有關。這意味著儘管高自我監控予人精明

的社會形象，它可能同時對情緒性心理健康指標（如憂鬱、焦慮、孤獨）產生負面影響，並對親密關係的培養、建立與維持有害。

上述研究結論係將自我監控視為類別構念做探討。而從 ASM 和 PSM 的多向度概念檢視其與心理健康的關係，Fuglestad 等（2019）發現 PSM 與成人焦慮型依附和迴避型依附有顯著正相關，並指出高 PSM 者和較低 PSM 者在各種親密關係（與母親、父親、親密伴侶、摯友的關係）中有較高的焦慮和逃避行為。ASM 則與焦慮型依附和迴避型依附無顯著相關。這說明自我監控與成人依附行為有關，而高 PSM 者在親密關係中可能因更多的逃避與焦慮行為導致親密關係發展困難，進而對其幸福感造成負面影響。相較於 ASM，PSM 似乎更適合作為負向心理健康指標的預測因子。然而，PSM 對心理健康的負向預測是否是恆定的？Twomey 與 O'Reilly（2018）檢視 Facebook 使用者對於自我監控和憂鬱的關係，發現低自我監控者的憂鬱機率是高自我監控者的 1.85 倍，且該效果在控制了五因素人格後仍達顯著（效果降至 1.48 倍）。此外，作者也發現低 ASM 者的憂鬱機率是高 ASM 者的 1.38 倍，而低 PSM 者的憂鬱機率是高 PSM 的 1.48 倍。這說明在網路世界中，無論是 ASM 或 PSM 均可作為憂鬱的緩衝因子。ASM 或 PSM 與各項心理健康指標的相關性，及其作用機制是否受情境（如網路／真實世界）或其他因子調節，均待更多實徵研究做進一步的檢驗。

從暗黑特質或是個體真實性的角度，或許也可以間接推論自我監控與幸福感的關係。Womick 等（2019）發現，暗黑四特質對個體真實性與幸福感之關係具調節作用；當個體為高真實性者時，無論其暗黑四特質分數高低，其幸福感均無顯著差異。然而，若個體為低真實性者，則高暗黑四特質者的主觀幸福感顯著優於低暗黑四特質者。換言之，有鑑於自我監控與低真實性（Pillow et al., 2007）、低誠實—謙遜性（Ogunfowora et al., 2013）的相關性，暗黑特質反而可能是高自我監控者幸福感的促進因子。

綜合上述，自我監控對部分心理健康指標具有預測力，尤以 PSM 與憂鬱、焦慮、孤獨等負向心理健康指標的證據力較為充分。ASM 與各項心理健康指標的相關性仍待實徵資料檢驗。由於目前探討自我監控與心理健康相關性的研究數量稀少，且目前國內對 ASM 和 PSM 與各項心理社會指標之關係缺乏概括性的認識，故本研究參照 Emmons 與 Diener（1985）、余民寧等（2011）以及 Jovanovic（2011）的作法，揀選「生活滿意度量表」（Wu & Yao, 2006）做為認知幸福感之指標，以及「正負向情感量表」（Watson et al.,

1988) 做為情感幸福感之指標，檢視 ASM 和 PSM 與主觀幸福感（含認知與情感層次）之相關性。本研究預測 PSM 與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為負相關，並且與負向情感為正相關。ASM 基於其外向、開放的特徵，可能與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呈正相關，並且與負向情感呈負相關。

六、國內自我監控研究現況

國內自我監控議題的研究成果目前均未提及 ASM 和 PSM 之概念，顯示國內研究思潮仍未觸及獲得型與保護型雙因子自我監控模式。其中，最為相關以及引用數最高者應屬吳宗祐與鄭伯壘（2006）探討自我監控與情緒勞動關係之研究。該文章翻譯了 Lennox 與 Wolfe（1984）所發展的 13 題修訂版「自我監控量表」，為包含「調整自我呈現的能力」7 題與「對他人表達行為的敏感度」6 題的雙因子自我監控量表，是相較於 SMS、SMS-R 信度最佳者（Day et al., 2002）。該量表具備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alpha = .78 \sim .87$ ），兩因素間的相關為 .49。然而，該量表並未提供效度相關指標，兩因素間的高相關也與 Arkin 的自我呈現理論、以及 Briggs 等（1980）的因素分析結果指出自我監控應為兩項互相獨立的因素組成之論點不符。故發展 APSMS-TC 有助於對國內提供更精確的自我監控測量工具，並進一步了解不同面向的自我監控與人際／職場行為與心理健康的關係。

七、小結

隨著心理計量學的深化，當代應對過去被視為單因子模式的自我監控理論重新審視，而「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或許是得以取替傳統派典的替代性模式。Wilmot 等（2017）所建立的 APSMS 由互為獨立的獲得型自我監控與保護型自我監控兩分量表所組成，符合 Arkin 所提出的自我呈現理論。且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全量表具良好的模式適配度，同時在施測上具有不受性別與年齡影響的測量恆等性，因此可視為近代雙因子自我監控測量的優良工具，並有助於近代學者重新以不同角度去審視自我監控與其他重要心理社會變項以及職場行為的關係。該量表之優勢在於其題項並非重新設計，而是以 SMS 為基礎重新篩選並進行後續的信效度檢測，作法上有利於國內將過去所蒐集的研究資料重新以 ASM 和 PSM 的觀點進行檢核，或許可對過去認為應產生而未產生預期效應的結果進行重新詮釋。本研究期望透過 APSMS-TC 的發展為國內提供一套精簡而準確的自我監控測量工具，並

為國內與國外近期發展的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模式思維接軌，奠定國內對雙因子自我監控認識的基礎。本研究同時探討了自我監控與人格特質、暗黑特質、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嘗試揭露自我監控的陰暗面及其與心理健康的相關性，因此具備充分的研究創新性與研究貢獻。

參、研究方法與結果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參與者為 18~25 歲的大學生。本研究之納入條件為母語為中文者，且排除條件為持有下列神經科／精神科診斷者：腦傷疾患或嚴重之中樞神經疾患、有癲癇病史者；情感性或心智疾病，如憂鬱症、恐慌症、躁鬱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泛自閉類群障礙等精神病史者。

本研究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預試（項目分析），包含部分題目內容微調與翻譯、確認內容效度，以決斷值、校正項目與總分相關，以及以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作為選題之標準，並檢驗預試題項的內部一致性。第二階段為正式施測，包含信度、驗證性因素分析、效標關聯效度檢驗。兩階段參與者分述如下。

（一）預試樣本

根據 Gorsuch (1983) 建議，欲進行項目分析之樣本數應至少為量表題數的 5 倍且大於 100 人，本研究共蒐集北部與東部 100 位大學生（69% 為女性，平均年齡 20.00 ± 1.45 歲）之資料進行預試。預試樣本科系以教育（56.6%）與醫學（32.3%）相關科系為主，占總樣本 88.9%。

（二）正式樣本

本階段以方便取樣蒐集北部、南部、東部共 9 所大學（北部 87%，南部 4%，東部 9%）的 621 名大學生之資料作為正式樣本（69.4% 為女性，平均年齡 20.38 ± 1.80 歲，1 參與者性別未填）。正式樣本科系所屬學院百分比前 5 位依序為：教育、管理、人文／社會、醫學、商（25.3%、22.4%、20.6%、10.1%、7.4%），占總樣本 85.8%。

二、研究工具

（一）「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

本研究採用 Wilmot 等（2017）提出的「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PSMS）進行中文版翻譯。本量表為雙因子量表，共計 13 題，包含獲得型自我監控 6 題，以及保護型自我監控 7 題。題目以李克特式 5 點量尺評分，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3 分—普通，到 5 分—非常同意。例題請見表 1。

本量表之題項均取自 SMS（Snyder, 1974）。Wilmot 等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重新選題，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新編之 13 題量表具有穩定的雙因子結構（RMSEAs = .076，SRMRs = .091）。信度方面，ASM 和 PSM 的 Cronbach's α 分別為 .77、.69，達可接受至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效度部分，ASM 與開放性、外向性具強烈程度正相關，PSM 與神經質性呈中度正相關，與友善性、嚴謹性則呈低到中度負相關。APSMS 與認知能力測驗無顯著相關性，顯示 APSMS 具良好的區辨效度。該量表透過差異試題功能檢驗，揭示 APSMS 同時具備跨性別及跨年齡的測量不變性。

（二）HEXACO-60

HEXACO-60 為 Lee 與 Ashton（2004）發展編製，中文版由 Hsu（2010）編修而成。該量表共 60 題，共有 6 項性格特質分量表，分別為誠實—謙遜性、情緒性、外向性、和悅性、嚴謹性及開放性。各分量表 10 題。選項從完全不同意 1 分到完全同意 5 分。HEXACO-60 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 = .74~.82）、效度與結構不變性（Hsu, 2010）。本研究於正式測驗階段發現，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72~.81）。

HEXACO-60 中所測量到的外向性、嚴謹性及開放性與常見的北美五大性格模式中（five factor model, FFM）（Costa & McCrae, 1992）所測量的構念雷同，主要差異反應在誠實—謙遜性、情緒性與和悅性，例如：誠實—謙遜性是 HEXACO-60 獨有的面向，與個人對權力掌握之偏好、控制別人以及自戀的傾向有關（Lee & Ashton, 2005）。再者，HEXACO-60 的情緒性與 FFM 中的神經質性雖然都以負面情緒為主，但 FFM 的神經質性多了關於憤怒、衝動及緊張之類的情緒。最後，HEXACO 的和悅性較 FFM 的友善性多了個人

情緒的（不）穩定性（如情緒容易產生波動或對憤怒情緒的控制等）之內涵。有關更多 HEXACO-60 與 FFM 的比較，可參考許功餘、張玉玲（2015）的文章。

（三）「生活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 Wu 與 Yao（2006）翻譯自 Diener 等（1985）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量表共 5 題，題目以李克特式 7 點量尺評分，選項從非常不同意 1 分到非常同意 7 分，評量參與者主觀知覺之整體生活的滿意度，作為評量認知層次主觀幸福感的指標。SWLS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87$ ）（曾文志，2007）和良好預測力，例如：對正向情緒、人際互動、工作表現均呈正相關，對負向情緒、敵意、神經質傾向則呈負相關（Diener et al., 2003）。本研究於正式測驗階段發現 SWLS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89$ ），因素負荷量介於 .36～.92。

（四）「正向與負向情感量表」

本研究採用 Watson 等（1988）所編製的「正向與負向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測量參與者一個月內之情緒狀態，以作為評量情感層次主觀幸福感的指標。量表共 20 題，包含 10 題正向（題項如熱衷、堅強）與 10 題負向（題項如不安、羞愧）的情緒辭彙。題目以李克特式 5 點量尺評分，選項從從不如此 1 分到經常如此 5 分。PANAS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與再測信度，以及良好的聚斂效度與區辨效度。本研究於正式測驗階段發現 PANAS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正、負向情感分量表 Cronbach's $\alpha = .81$ 、.83），因素負荷量在 .38～.78。

（五）「簡式暗黑四特質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繁體中文版「簡式暗黑四特質量表」（Short Dark Tetrad-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SD4-TC），係由張益慈等（2021）翻譯自 Paulhus 等（2020）所編製的「簡式暗黑四特質量表」。量表共包含馬基維利主義（題例如「讓別人知道你的秘密是不明智的」）、自戀（題例如「人們視我

為天生的領導者」）、病態人格（題例如「人們常說我不受控制」）、虐待（題例如「看別人打架會讓我感到興奮」）等四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有 7 題，共計 28 題。量表以李克特式 5 點量尺評分，選項從非常不同意 1 分到非常同意 5 分；分量表得分愈高，表示該構念傾向愈高。SD4-TC 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65 \sim .84$ ）與再測信度（ $r_s = .74 \sim .85$ ），並具有合理適配的建構效度（RMSEA = .07，SRMR = .08）與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

三、「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編製過程

（一）翻譯及編修，形成預試量表

本研究於 2020 年 4 月取得 Wilmot 同意後始將原始量表進行中文化。由於 APSMS 之題項係從 SMS 中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挑選而出，而本研究發現國內有邱書雅（2007）提供翻譯自 Snyder 與 Gangestad（1986）所修訂的「自我監控量表」內容（全量表 Cronbach's $\alpha = .82$ ）。因此，本研究在經比對原文相同且文意清晰的狀況下，保留部分邱書雅所提供的題項內容或進行編修，其餘題項則由研究團隊進行翻譯，確認翻譯後的中文文意清晰，能確實反應原文題項所陳之語意並符合時代性。本研究先請兩位大學生進行前測，確認翻譯後語句的可讀性與可理解性，始進行預試。

（二）項目分析

1. 決斷值

本研究以各分量表總分最高與最低 27% 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求出量表各題項的決斷值（CR 值），以及高、低二組在各題項的平均差異顯著性，藉此了解本量表各題項之鑑別度。結果發現，除 PSM 分量表的第 1 題 CR = 2.73（ $p = .008$ ），其餘題項 CR 均大於 3.0（ $ps < .001$ ）（如表 1 所示），顯示多數題項具良好鑑別度。

2. 校正項目與總分相關係數

ASM 分量表各試題與總分的相關在 .56～.74，PSM 分量表各試題與總分的相關在 .41～.67，顯示各分量表題目間具有高同質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APSMS-TC 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與題目內容	CR 值	總分 相關	因素 負荷量
「獲得型自我監控 ASM」分量表 (Cronbach's $\alpha = .76$)			
1. 我對於不清楚的主題，亦能發表一場即席演說。	5.52***	.57***	.47
2. 如果我去演戲，應當是一個不錯的演員。	8.53***	.74***	.71
3. 在一群人當中，我很少成為注目的焦點。(R)	8.66***	.70***	.56
4. 我曾經考慮當一名綜藝咖／諧星。	7.85***	.67***	.67
5. 我從不擅長於比手畫腳的遊戲或即興表演。(R)	9.80***	.74***	.61
6. 在社交場合中，我多半聽別人講笑話和說故事。(R)	6.31***	.65***	.54
「保護型自我監控 PSM」分量表 (Cronbach's $\alpha = .68$)			
7. 我的行為經常能如實反應我的感受、態度及信念。(R)	2.73**	.41***	.22
8. 當我不確定在社交場合該如何表現時，我會從別人的行為中尋找線索。	3.18**	.52***	.51
9. 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人，我的行為舉止也將全然不同。	5.62***	.60***	.54
10. 即使不開心，我也經常假裝自己過得很開心。	6.92***	.67***	.69
11. 我並不總是那個我所表現出來的人。	8.54***	.65***	.55
12. 為了被喜歡，我傾向成為人們期望我成為的樣子。	5.58***	.65***	.50
13. 即使我不喜歡某人，我也會裝成友善的樣子。	7.13***	.60***	.44

註：(R)表反向題。

** $p < .01$; *** $p < .001$

3.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依循 Wilmot 等 (2017) 進行因素分析之準則，以主軸法及 Pro-max 轉換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並依其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二因子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擁有最佳解（相較於三因子），將結構固定因子數目設為 2。結果顯示 Bartlett's 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314.691 ($p < .001$)，KMO 值為 .72，達可進行因素分析的適切性。經檢驗第一因素特徵值為 3.33，解釋 20.77% 的變異量；第二因素特徵值為 2.20，解釋 11.91% 的變異量；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32.68%。因素負荷量結果顯示，PSM 第 1 題因素負荷量未達 .30，其餘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在 .44 ~ .71（如表 1 所示）。

4. 信度分析

在預試階段，ASM 和 PSM 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76、.68，顯示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如表 1 所示）。

在預試階段，除 PSM 第 1 題的 CR 值與因素負荷量均小於 .30 外，其餘題項均具有良好的鑑別度與同質性。然考量本量表後續應用性與未來可進行跨文化研究之比較，故本研究不對量表進行刪題動作，遂維持與原量表相同共計 13 題之正式版本進行後續施測。

四、APSMS-TC 正式施測

（一）信度分析

ASM 和 PSM 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77、.67，顯示 APSMS-TC 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另外，ASM 和 PSM 分量表之組合信度分別為 .77、.67，兩者均大於 .60（Fornell & Larcker, 1981），顯示具有理想的組合信度。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APSMS-TC 全樣本與各性別樣本之描述統計、差異檢定效果值

	全樣本 (n = 621)	男性 (n = 189)	女性 (n = 431)	Cohen <i>d</i>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獲得型自我監控	2.68 (.75)	2.86 (.78)	2.60 (.73)	.36***
保護型自我監控	3.46 (.54)	3.45 (.54)	3.46 (.54)	.02

註：1 樣本性別未填。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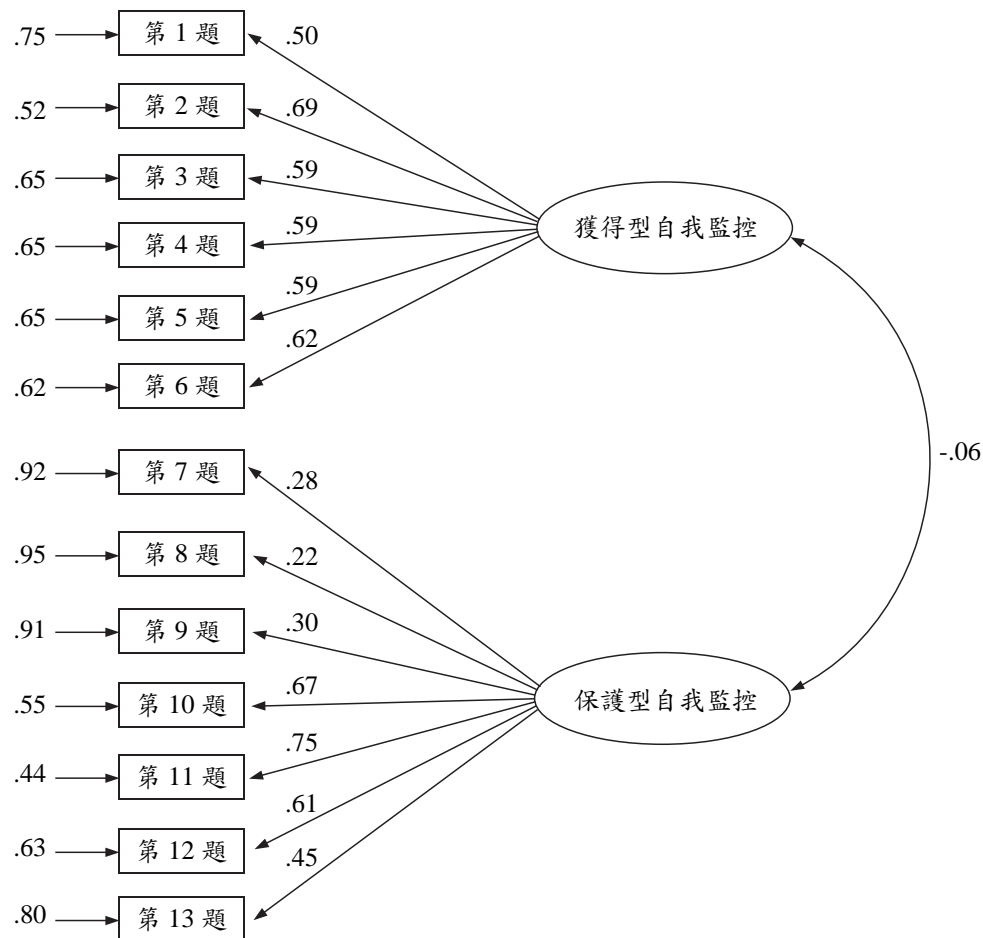
（二）效度分析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 AMOS 22.0 最大概似法估計模型適配度。結果如下：卡方考驗 $\chi^2 = 290.76$ ， $p < .001$ ， $df = 64$ ， $\chi^2/df = 4.54$ ，均方接近似誤（RMSEA）= .08，適配度指標（GFI）= .93，修正的適配度指標（AGFI）= .90，比較

適配指標 (CFI) = .85，標準化均方根殘差 (SRMR) = .06。所有題項之標準化係數 = .22~.75。CFA power ($1-\beta$) = .99。依 Kline (2011) 建議採用四種最被廣泛使用的適配指標，GFI 與 CFI 達 (或接近) 一般 .90 的建議，SRMR 與 RMSEA 均符合 .08 以下的合理適配標準。由此可知，APSMS-TC 在大學生樣本上具有穩定的雙因子結構，並具有可接受的模式適配度 (如圖 1 所示)。

圖 1 APSMS-TC 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及模型參數估計值



2. 效標關聯效度

APSMS-TC 與效標變項間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與 Wilmot 等 (2017) 的發現相同，ASM 與開放性、外向性分別具有中等與強烈程度正相關 ($r_s = .24$ 、 $.54$ ， $ps < .001$)，以及 PSM 與情緒性呈正相關 ($r = .14$ ， $p < .01$)。但在其他人格向度，本研究則與 Wilmot 等的發現有不同之處，例如：本研究發現 ASM 與情緒性呈負相關，以及 PSM 與外向性呈中度負相關。另外，ASM 和 PSM 均與誠實—謙遜性呈顯著低度負相關，且均與嚴謹性、和悅性無顯著相關。

在主觀幸福感部分，ASM 與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均呈正相關 ($r_s = .16$ 、 $.37$)，PSM 與生活滿意度呈負相關 ($r = -.26$)，而與負向情感呈正相關 ($r = .30$)。在暗黑特質方面，ASM 被發現與自戀、病態人格與虐待均呈顯著正相關 ($ps < .01$)，其中以自戀的相關性最高 ($r = .60$)；PSM 被發現與馬基維利主義、病態人格與虐待均呈顯著正相關 ($r_s = .10 \sim .33$ ， $ps < .05$)，其中以馬基維利主義的相關性最高 ($r = .33$)。本研究結果與 Rauthmann (2011) 指出，馬基維利主義與 PSM 有特別突出的正相關、自戀與 ASM 有特別突出的正相關，以及病態人格與 ASM 和 PSM 均有顯著正相關的結果相同。另外，也與 Kowalski 等 (2018) 結果指出，SM 與馬基維利主義、自戀以及病態人格呈現顯著正向相關的結果一致。

(三) 跨性別之測量恆等性檢定

在確認 APSMS-TC 具有良好適配的模式後，本研究使用 AMOS 多群組分析檢驗該模式是否具備跨性別之測量恆等性。本研究採用卡方差量 ($\Delta\chi^2$)、 ΔCFI 與 ΔTLI 作為檢驗不同模式因素恆等性的指標。當巢套模式間的 $\Delta\chi^2$ 未達顯著，且 $\Delta CFI < .01$ 、 $\Delta TLI < .02$ ，表示檢驗模式之恆等性成立。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基線模型為標準，將量尺設為恆等時與基線模型做比較，其卡方值差異未達顯著，且 $\Delta CFI < .01$ ， $\Delta TLI < .02$ [$\Delta\chi^2 = 8.75$ ， $p = .65$ ， $\Delta CFI = .001$ ， $\Delta TLI = .017$]，顯示 APSMS-TC 具有跨性別的量尺恆等性。接著以量尺為標準，將截距設為恆等時與量尺恆等模型做比較，其卡方值差異具顯著性，且 $\Delta CFI > .01$ [$\Delta\chi^2 = 33.547$ ， $p = .001$ ， $\Delta CFI = -.015$ ， $\Delta TLI = -.001$]，顯示 APSMS-TC 不具跨性別的截距恆等性。最後，由於跨性別截距恆等性上未成立，多群組分析止於此。

表 3 APSMS-TC 與各效標之相關結果

因素名稱	獲得型自我監控	保護型自我監控
人格特質		
誠實—謙遜性	-.24***	-.23***
開放性	.24***	.07
嚴謹性	-.02	-.03
外向性	.54***	-.27***
和悅性	-.01	-.03
情緒性	-.10*	.14***
主觀幸福感		
生活滿意度（認知層次）	.16***	-.26***
正向情感（情感層次）	.37***	-.12
負向情感（情感層次）	-.04	.30***
暗黑特質		
馬基維利主義	.05	.33***
自戀	.60***	-.06
病態人格	.22***	.10*
虐待	.12**	.18***

註：N = 621。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四）性別差異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男性在 ASM 得分顯著高於女性（ $d = .36$ ，如表 2 所示），PSM 則無顯著性別差異。

肆、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繁體中文版「獲得型—保護型自我監控量表」（APSMS-TC），並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信度方面，APSMS-TC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與組合信度（ASM 之 Cronbach's $\alpha = .77$ ，CR = .77，PSM 之 Cronbach's $\alpha = .67$ ，CR = .67）。效度方面，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APSMS-TC 雙因子結構達可接受的模式適配度（GFI = .93，CFI = .85，RMSEA = .08，SRMR = .06）。此外，兩因素無顯著相

關 ($r = -.06$)，與 Wilmot 等 (2017) 的發現一致，此不僅支持 Arkin (1981) 提出的自我呈現理論，也符合 Briggs 等 (1980) 的因素分析結果。APSMS-TC 具備跨性別的量尺恆等性，但不具截距恆等性，顯示男性與女性的自我監控表現於起始點上有差異。該結果可用過去發現男性較女性擁有更高的自我監控特質作為輔助解釋 (Day et al., 2002)，這可能源自於社會角色理論 (Eagly, 1987) 中，提及大眾對男性的社會角色賦予了更多與領導有關的特質 (如獨立、自信)，或是晉升職場管理與決策者的期待有關。

效標關聯效度部分，本研究與 Wilmot 等的發現一致：ASM 與開放性、外向性呈正相關，PSM 與情緒性呈正相關。另外，本研究發現 ASM 和 PSM 均與誠實—謙遜性呈中度負相關，此結果與 Ogunfowora 等 (2013) 的發現一致，也與 Pillow 等 (2017) 指出自我監控與低自我一致有關、Huang 等 (2019) 指出自我監控與表層行為 (surface acting) 具有強烈正相關的結果呼應。本結果說明自我監控作為一種自我呈現的社交技巧與能力，無論是透過獲得型意圖以贏得社會認可，或是基於保護型意圖以避免社交拒絕，當中可能都隱含了非誠實—謙遜、利己的一面，以及實際外在表現行為與內在情感狀態的落差。但是否有第三種真誠、不具負向社交行為的自我監控？值得讀者未來進一步思考或探討。另外，本研究在 PSM 與其他人格特質間的相關性結果與 Wilmot 等 (2017) 的發現有差異處。該研究揀選 FFM 為效標，發現 PSM 與嚴謹性呈中度負相關 ($r_s = -.19 \sim -.25$)，且與友善性呈低度負相關 ($r = -.12$)，然而本研究卻未發現 PSM 與嚴謹性、和悅性的相關性。本研究揀選 HEXACO 作為效標發現，PSM 與外向性呈中度負相關，但該研究卻未有相同結果。因此，除了與情緒性／神經質性的相關性較為一致外，本研究與 Wilmot 等所提供的 PSM 與人格特質間相關性之指標有較大落差。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差異原因可能係由不同性格模式的測量所導致。雖然在向度上的命名相似，但 HEXACO 中的和悅性、情緒性 (以及誠實—謙遜性共 3 項) 並不同於 FFM 所指的友善性、神經質性 (許功餘, 2018)，例如：HEXACO 所測得之情緒性以憂鬱、焦慮、恐懼及情緒波動為主，包含個體是否容易感到恐懼、緊張、焦慮，是否需要他人協助、鼓勵，是否容易感染他人情緒，或對分離感到焦慮等，但並不包含生氣、憤怒等負向情緒。而生氣、憤怒等負向情緒，以及對衝動的控制與調節、對被冒犯的敏感程度以及因應行為等，則包含在 HEXACO 的和悅性中。換言之，FFM 所測得的神經質性包括了 HEXACO 中的情緒性與和悅性。因此，本研究認為 PSM 與

HEXACO 的情緒相關性較弱的原因，可能係因 HEXACO 的情緒性未包含負向情緒的部分，因此削弱了效果。

與 Rauthmann (2011) 及 Kowalski 等 (2018) 發現一致，本研究發現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具有正相關，其中以自戀與 ASM、馬基維利主義與 PSM 有突出的相關性外，病態人格、虐待也分別與 ASM 和 PSM 具有正相關；該結果增加了自我監控與暗黑特質相關性在華人樣本中的相關證據，說明不同面向的自我監控與不同的暗黑特質有關，同時再次證實 ASM 和 PSM 在構念上的分歧。自戀與 ASM 具有共同的特徵；高自戀者對社會情境訊息敏感並且特別重視社會悅納，因此可能透過 ASM 吸引他人注意、獲得他人讚賞的外向、表演行為，以融入於社交情境。馬基維利主義和 PSM 有強烈正相關的原因，可能出自於對自身行為表現適切性的關切，因為這決定了他們是否成功地對他人實施操縱行為。與馬基維利主義相同，病態人格也可以透過調整他們的行為表現，進而達到成功剝削、操縱他人的目的，同時透過主動的趨近策略才有辦法找到潛在的受害者，因此合併 ASM 和 PSM 兩種特徵，並以 ASM 為主。而虐待也同時合併了 ASM 和 PSM 兩種特徵，但以 PSM 為主。不同於高馬基維利主義者非常重視自身名譽的特質 (Jones & Paulhus, 2010)，高病態人格者可能因其反社會的性格本質，而對於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興趣缺缺 (Rauthmann, 2011)。Rauthmann (2011) 發現，病態人格的「衝動、追求刺激」和「人際操縱」特質均與 ASM 中的「知覺性」(perceptiveness) 具正相關；同時，病態人格的「人際操縱」特質也和 PSM 中的「保護性變異」(protective variability) 具正相關，說明病態人格可同時透過 ASM 和 PSM 作為成功人際操縱的基礎。另外，Erikson (2017/2019) 指出，由於病態人格有著變色龍的特徵：缺乏真實的自我性格、總是扮演著某種角色，並且會為了一己私利而模仿他們所看到的行為；這也與 Snyder (1974) 指出高自我監控者的變色龍特質相符。有鑑於上述暗黑特質常見於組織行為範疇的探討，檢視暗黑特質與自我監控的交互作用對人際關係、組織行為的影響機制在未來應具有豐富的探索價值。

在心理健康方面，本研究發現 ASM 對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具正向預測力，PSM 則對生活滿意度具負向預測力，並且對負向情感具正向預測力，顯示不同向度的自我監控對正、負向心理健康指標的預測力不同。本研究發現，PSM 對心理健康指標的負向預測力大致與過去研究發現相符，並增添了 ASM 對於心理健康正向預測力的實徵證據。高 ASM 者擁有較為外向、開放

的性格，可透過趨近性的社交策略獲得社會認同，進而提升其生活滿意度與正向情緒。高 PSM 者較高的情緒性特徵可能導致其在面對社交情境時帶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傾向以觀察、被動的方式展現出適當的一面，盡可能降低不被社會認可的風險。Lennox (1988) 指出，高 ASM 者可能將每一次社交情境視作機會並帶著樂觀的眼光，高 PSM 者則可能以較為悲觀或是帶著恐懼的方式面對社交情境，而兩者的差別可能來自於其自我價值。本研究以主觀幸福感為指標進行自我監控與心理健康相關性的初探，而自我監控對心理健康（如憂鬱、幸福感）的相關性是否受暗黑特質、自尊等其他因子調節，將有賴未來研究進行更細緻的檢驗。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的自我監控性別差異僅反應在 ASM 而未反應在 PSM 上，與 Wilmot 等 (2017) 指出男性有高於女性的 ASM 和 PSM 得分結果不同。這顯示在東方文化下，男性的 PSM 特質與女性無顯著差別。然而，Wilmot 等 (2017) 並未提供其研究男性與女性在 ASM 和 PSM 的平均得分數據，故無從推論本研究發現男性和女性在 PSM 上無顯著差異，究竟是因為本土男性大學生在 PSM 得分下降，抑或是本土女性大學生在 PSM 得分上升所導致。由於本研究為首次探討華人樣本 ASM 和 PSM 在性別上的差異，自我監控在性別差異結果上的穩定性將有賴更多本土研究進行重複驗證。另外，從描述性統計的角度切入檢視 Wilmot 等 (2017) 與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兩研究所測得的 PSM 平均值均高於 ASM 平均值（本研究：ASM $M = 2.68$ ，PSM $M = 3.46$ ；Wilmot 等的研究：樣本一 ASM $M = 2.84$ ，PSM $M = 3.38$ ；樣本二 ASM $M = 2.98$ ，PSM $M = 3.54$ ），說明無論在東西方文化中，個體的 PSM 傾向均高於 ASM。儘管被指出對負向心理健康指標（如憂鬱、焦慮）具有預測性，PSM 或許正如其名可於人際情境中起到保護的作用，在某些情境中達到緩衝憂鬱的效果。且在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採取趨避性策略、避免被社交拒絕的 PSM 特質，並不遜於採取趨近性策略、期望獲得社會認同的 ASM。這說明 PSM 在人際情境中參與的程度可能遠比過往所認知到的更為廣泛，只是因其擅於隱藏的本質而長久以來被忽略了。而 ASM 雖可對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帶來正面影響，然其平均值顯著低於 PSM 的結果，說明 PSM 仍為大多數人身上顯著的特質，且無論在東西方社會中亦同。因此，PSM 在人際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職場行為或心理健康作用機制的影響，在未來應受到更多重視。

本研究有以下幾項研究限制：一是本研究係透過方便取樣以國內大學生

為主要樣本，與 Wilmot 等（2017）使用社區成人為主要樣本的設計不同。有鑑於自我監控原為工商心理學常見議題，後續研究可將 APSMS-TC 應用於國內企業組織，檢驗該量表跨年齡的測量恆等性；或是加入背景變項（如年資、職位），探討個體自我監控對其他工作表現（如薪資、領導力）之調節效果。另外，本研究在自我監控與人格特質的相關性，以及自我監控性別差異的部分都與原著發現有些許差異。然而，本研究係以量表編製為主，未同時檢驗可能形成上述差異的文化或社會因子，是為本研究在解釋結果上的限制之一。自我監控在東方集體主義社會與儒家謙遜思想的薰陶下，或許會形塑出其在西方社會強調獨立、競爭信念下的不同樣貌。本研究建議，未來可納入社會或是文化因子變項的測量，以利後續研究增進對自我監控的文化差異或是性別議題的深入了解。最後，本研究證實 ASM 和 PSM 對主觀幸福感具有不同的預測力，後續研究可搭配其他潛在的調節因子與心理健康指標進行結構方程式檢驗，增進雙因子自我監控與其他變項的理論模式驗證。

本研究成果對工商組織、社會心理學、諮商輔導等多元領域具有應用價值。自我監控議題原屬工商組織心理學議題，而本研究所發展的 APSMS-TC 兼具了測量上的經濟效益（僅 13 題）與準確性，故可廣泛應用於國內企業組織，以進行適當的工作安置（Leone, 2021）。此外，隨著對雙因子自我監控的認識，過去相關研究的成果如今可使用雙因子自我監控模式進行重新分析與詮釋，例如：透過控制 PSM 的影響，重新檢視 ASM 與諸多職場行為（如領導力）的相關性。Moser 與 Galais（2007）的研究指出，ASM 可作為年資與銷售表現的調節因子：對於年資較短的銷售人員而言，ASM 與銷售表現呈正相關；然而對於年資較長的銷售人員而言，ASM 與銷售表現呈負相關。這意味著那些在初期透過良好的形象管理在現場銷售業績勝出的人，在長期的現場銷售工作中表現反而較差（引自 Kückelhaus et al., 2020）。植基於此，組織在了解個人的 ASM 和 PSM 後，可針對個人進行訓練發展或職涯輔導協助。另外，基於自我監控與不同暗黑特質的相關性，自我監控或許也可作為組織行為中的警訊，例如：Hogan 與 Hogan（2007）在「霍根性格測驗」（Hogan Personality Inventory, HPI）中提到，個體的某些特質雖有助於其發展領導力，然而當性格發展至極端或是處於壓力狀態下時，則可能形塑成引起組織崩壞的陰暗面（如自大、狡猾、完美主義或戲劇化性格）。由於近期研究已指出自我監控有其陰暗面或潛在風險，高自我監控者究竟可透過個人魅力凝聚組織向心力，抑或是破壞團隊合作關係的權力遊戲推手，本研究

期望自我監控在未來有更多跨領域的合作發展並受到更多關注。最後，不同類型的自我監控被發現與多項心理健康指標具有不同的預測力，且可作為部分人格特質、情緒調節策略（如暗黑特質、情緒壓抑）對心理健康指標（如幸福感、孤獨）的調節因子。自我監控在未來亦可應用於社會心理學或諮商輔導領域議題（如從眾行為、親密關係），並探討其對個體心理健康的作用機制。

謝誌

本研究感謝下列師長協助收案（以下按單位與姓氏筆劃排列）：東吳大學法律系楊健弘助理教授、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沈宜璇副教授、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林雲雀副教授、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林慧慈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造力發展研究所洪綵蔚小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張雨霖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吳清麟副教授，以及輔仁大學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林耀南教授，並感謝所有參與本案之參與者。本研究獲教育部核定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華語文科技研究中心」，以及「大專校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教育學領域）」之支持與經費補助，特此感謝。本研究作者群感謝審查委員耐心指導與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教師主觀幸福感模式建構與驗證之研究。**測驗學刊**，**58**（1），55-85。https://doi.org/10.7108/PT.201103.0055
- 吳宗祐、鄭伯壘（2006）。難應付客戶頻次／知覺服務訓練效用兩者及情緒勞動與情緒耗竭之關係：「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管理學報**，**23**，581-599。https://doi.org/10.6504/JOM.2006.23.05.04
- 邱書雅（2007）。保險業務員之自我監控傾向與其銷售行為、銷售績效之關聯性（碩士論文）。取自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342/NTU.2007.01229
- 張益慈、詹雨臻、陳學志（2021）。繁體中文版「簡式暗黑四特質量表」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測驗學刊**，**68**（4），287-316。
- 戚樹誠（2016）。**組織行為：台灣經驗與全球視野**（二版）。雙葉書廊。
- 許功餘（2018）。華人青少年性格向度的構念檢核：與北美性格向度之異與同。**中華心理學刊**，**60**，1-31。
- 許功餘、張玉玲（2015）。費力控制與 HEXACO 性格向度對青少年內化與外化問題行為之預測效果。**中華心理學刊**，**57**（1），1-25。https://doi.org/10.6129/CJP.20141105
- 陳心懿、鄭宇容（2018）。自我監控人格、文化智力與職涯投入之關係探討：以海外台灣工作者為例。**企業管理學報**，**117**，1-20。https://doi.org/10.3966/102596272018060117001
- 曾文志（2007）。大學生對美好生活的常識概念與主觀幸福感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417-441。https://doi.org/10.6251/BEP.20070120
- 簡明輝（2004）。**組織行為**。新文京開發。
- 羅妙虹、陳建志、謝秉蓉（2018）。自我監控對情緒勞務與身心健康之調節效果：以南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為例。**特殊教育學報**，**47**，33-62。
- Erikson, T. (2019)。無良這種病：瑞典行為科學家教你利用 DISA 性格學，徹底擺脫病態人格者的暗黑操控（林麗冠譯）。時報文化。（原著出版年：2017）
- George, J. M., & Jones, G. R. (2004)。**組織行為**（吳玲玲審訂）。智勝文化。（原著出版年：2003）

Robbins, S. P. (2006)。組織行為（林財丁、林瑞發譯）。滄海。（原著出版年：2005）

英文部分

- Arkin, R. M. (1981). Self-presentation styles. In J. T. Tedeschi (Ed.),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p. 311-333).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C2013-0-11591-7>
- Bauman, K. P., & Geher, G. (2002). We think you agree: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the false consensus effect on behavior. *Current Psychology*, 21, 293-318.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02-1020-0>
- Bedeian, A. G., & Day, D. V. (2004). Can chameleons lead?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5, 687-718. <https://doi.org/10.1016/j.leaqua.2004.07.005>
- Briggs, S. R., & Cheek, J. M. (1988). On the nature of self-monitoring: Problems with assessment, problems with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663-67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4.663>
- Briggs, S. R., Cheek, J. M., & Buss, A. H. (1980). An analysis of the self-monitoring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679-68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8.4.679>
- Corral, S., & Calvete, E. (2000). Machiavellianism: Dimensionality of the Mach IV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monitoring in a Spanish sample.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3, 3-13. <https://doi.org/10.1017/S1138741600005497>
- Costa, P. T. Jr., & McCrae, R. R. (199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and NEO-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rofessional manua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
- Day, D. V., Schleicher, D. J., Unckless, A. L., & Hiller, N. J. (2002).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y at work: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2), 390-401.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7.2.390>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4901_13
- Diener, E., Oishi, S., & Lucas, R. E. (2003).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4.101601.145056>
- Dutton, K. (2013). *The wisdom of psychopaths : Lessons in life from Saints, spies and serial*

- killers. William Heinemann. <https://doi.org/10.1038/scientificamerican1012-76>
- Eagly, A. H. (1987).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 social-role interpreta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Edwards, A. L. (1957).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variable in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Holt, Rinehard and Winston.
- Emmons, R. A., & Diener, E. (1985).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1(1), 89-9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85111008>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https://doi.org/10.2307/3151312>
- Fuglestad, P. T., Leone, C., & Drury, T. (2019). Protective and acquisitive self-monitoring differences i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voidance. *Self and Identity*, 19(2), 219-234.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19.1570969>
- Gorsuch, R. L. (1983). *Factor analysi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ogan, R., & Hogan, J. (2007). *Hogan personality inventory manual* (3rd ed.). Hogan Assessment Systems.
- Hsu, K. Y. (2010). *Age differences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HEXACO-PI-R from early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Huang, S., Yin, H., & Tang, L. (2019). Emotional labor in knowledge-based service relationships: The roles of self-monitoring and display rule percep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APR).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0801>
- Jones, D. N., & Paulhus, D. L. (2010). Differentiating the Dark Triad within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In L. M. Horowitz & S. N. Strack (Eds.), *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49-267). Guilford Press.
- Jovanovic, V. (2011). Do humor styles mat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 502-507. <https://doi.org/10.1111/j.1467-9450.2011.00898.x>
- Kline, R. B. (2011).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3rd ed.). Guilford Press.
- Kowalski, C. M., Rogoza, R., Vernon, P. A., & Schermer, J. A. (2018). The dark triad and the self-presentation variable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and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0, 234-23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7.09.007>
- Kückelhaus, B. P., Blickle, G., Titze, J. L., & Wihler, A. (2020). Self-discipline and protec-

- tive self-monitoring in sales: A 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7, 11022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0.110225>
- Kudret, S., Erdogan, B., & Bauer, T. N. (2018).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y trait at work: An integrative narrativ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0, 193-208. <https://doi.org/10.1002/job.2346>
- Lee, K., & Ashton, M. C. (2004).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EXACO personality inventory.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 329-35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06mbr3902_8
- Lee, K., & Ashton, M. C. (2005). Psychopathy, Machiavellianism, and narcissism in the five-factor model and the HEXACO model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7), 1571-158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4.09.016>
- Lennox, R. (1988). The problem with self-monitoring: A two-sided scale and a one-sided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 58-73.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5201_5
- Lennox, R. D., & Wolfe, R. N. (1984). Revision of the Self-Monitoring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6), 1349-136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6.6.1349>
- Leone, C. (2021). Self-monitoring, self-selection, and prospective employ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inding a workplace nic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80/00221309.2021.1913396>
- Leone, C., & Hall, I. (2003). Self-monitoring, marital dis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orientations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Self and Identity*, 2, 189-202.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0390209017>
- Lippa, R. (1978). Expressive control, expressive consistency, a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xpressive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6, 436-461.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78.tb01011.x>
- Morrison, K. A. (1997).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for a sample of business owners/managers: Associations with scores on self-monitoring, type A behavior, locus of contro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Reports*, 80(1), 255-272. <https://doi.org/10.2466/pr0.1997.80.1.255>
- Ogunfowora, B., Bourdage, J. S., & Nguyen, B. (2013). An exploration of the dishonest side of self-monitoring: Links to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unethical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7, 532-544. <https://doi.org/10.1002/per.1931>
- Oyamot, C. M. Jr., Fuglestad, P. T., & Snyder, M. (2010). Balance of power and influence

- in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self-monitor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7(1), 23-46.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09347302>
- Paulhus, D. L., & Williams, K. 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 556-563. [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
- Paulhus, D. L., Buckels, E. E., Trapnell, P. D., & Jones, D. N. (2020). Screening for dark personalities: The Short Dark Tetrad (SD4).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https://doi.org/10.1027/1015-5759/a000602>
- Pillow, D. R., Hale, W. J., Crabtree, M. A., & Hinojosa, T. L. (2017).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f-monitoring, authenticity, and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6, 393-39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7.04.060>
- Rauthmann, J. F. (2011). Acquisitive or protective self-presentation of dark personalities? Associations among the dark triad and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1(4), 502-50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1.05.008>
- Sampson, E. E. (1978). Personality and the location of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6, 552-568.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78.tb01017.x>
- Smith, C. V., Lair, E. C., & O'Brien, S. M. (2019). Purposely stoic, accidentally alone? Self-monitoring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loneli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9, 286-29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9.06.012>
- Snyder, M. (1974). Self-monitoring of expressiv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4), 526-537. <https://doi.org/10.1037/h0037039>
- Snyder, M., & Gangestad, S. (1986). On the nature of self-monitoring: Matters of assessment, matters of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25-13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1.1.125>
- Twomey, C., & O'Reilly, G. (2018). The association of 'self-monitoring' with depression in help-seeking facebook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64(5), 482-487. <https://doi.org/10.1177/0020764018778700>
-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6.1063>
- Wilmot, M. P. (2015). A contemporary taxometric analysis of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self-monitoring.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7, 353-364. <https://doi.org/10.1037/pas0000030>
- Wilmot, M. P., Kostal, J. W., Stillwell, D., & Kosinski, M. (2017). Using item response the-

- ory to develop measures of acquisitive and protective self-monitoring from the original self-monitoring scale. *Assessment*, 24(5), 677-691. <https://doi.org/10.1177/1073191115615213>
- Womick, J., Foltz, R. M., & King, L. A. (2019). “Releasing the beast within”? Authenticity, well-being, and the dark tetra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7, 115-12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8.08.022>
- Wu, C. H., & Yao, G. (2006). Analysis of factorial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in the Taiwan version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0 (6), 1259-126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5.11.012>
- Yang, J., Yu, K. H. F., & Huang, C. J. (2018). Service employees’ concurrent adaptive and unethical behaviors in complex or non-routine tasks: The effects of customer control and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https://doi.org/10.1007/s10490-018-9567-y>